

Sin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s through the Lens of Mainstream American Media: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1980–2010

Ma Hongxi

Abstract: Building a positive national image and objective and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opinion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a state's foreign diplomacy. From both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critical for China. Nonetheless, bilateral territorial disputes continue to be a key barrier for both state to state and people to peopl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oth China's Japan policy and Japan's China policy cannot escape American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ss media play a key behind the scenes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The authors have collected 98 reports on Sin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s from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outlet,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1980-2010, and categorize and analyze them towards the goal of illustrating the views of mainstream American opinion towards Sino-Japanese bilateral ties under different time periods.

Key Words: Media Opinion; Territorial Disputes; National Image; Public Diplomacy

Author: Ma Hongxi is an MA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 Diplomatic Affair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研究

——以《纽约时报》（1980～2010年）为例*

马洪喜

内容提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一个国家开展外交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战略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中日双边关系对中国来说均举足轻重，但是双边领土争端问题却成为横亘在两国政府和民间的重要障碍。无论是中国的对日政策还是日本的对华政策，都离不开美国因素的干扰，而媒体舆论又是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因素，因此，本文搜集了1980～2010年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关于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98篇新闻报道，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研究和分析，力图再现时代条件制约下美国大众传播媒体有关中日双边关系的评论。

关键词：媒体舆论 领土争端 国家形象 公共外交

作者简介：马洪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问题缘起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双方来讲均毋庸置疑，但长期以来领土争端问题却成为摆在两国政府和民间面前的一个重要障碍，给中日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 本论文得到张绍铎老师的指导，特此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带来了不利影响。中日领土争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二是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分歧日渐突出，争端也愈演愈烈。

除了影响中日关系的领土争端因素外，美国因素也不容忽视。时殷弘主张，中国应该从总体的战略角度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以及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① 时教授是从对美战略高度来认识中日关系的，而日本的对华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制约。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立足点。不论是对美“协调”派还是对美“自主”派掌权，冷战期间的日本历届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只有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走得多远的区别，而不存在突破美国允许范围的情况。^② 冷战后同样如此。

由此可见，研究中日关系，在关注两国之间领土争端问题的同时，必须考虑美国因素，对这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更加不可或缺。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研究美国舆论如何认知中日之间的双边议题。

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一向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尽管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持有人的左右，但它仍然对广大读者的政治取向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③ 在对外政策方面，媒体起着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媒体会直接影响总统的态度；另一方面，媒体会间接地吸引公众对某个事件的注意。^④ 美国媒体当然也不例外。

美国政府一般都很关注媒体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和主要倾向，还设有与媒体打交道的专门机构，专门对各种媒体对各项政策的态度和反应进行分类和分析。^⑤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Gabrial Almond) 在对大量数据和历史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美国民众对外交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的基

① 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第72页。

②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国（1945—1972）』，東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260页。

③ Julianne Schultz, *Reviving the Fourth Estate: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2.

④ 夏尔·菲利普·戴维、路易·巴尔塔扎、于斯丹·瓦伊斯：《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

⑤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页。

本知识所掌握的信息量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无知。^① 因此，一般公众对外交事务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新闻媒体而来。媒体可以说是影响民众去关心什么议题以及形成何种意见的重要社会工具。^② 正因如此，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媒体对他国或国际事务的报道往往会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无论媒体的报道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公众的接受程度都很高。^③ 同样，美国媒体对中日双边关系的报道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者对两国关系的审视和定位。本文拟通过对《纽约时报》在 1980~2010 年间对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相关报道的梳理和分析，考察该报对上述议题报道的变化趋势，分析其报道内容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揭示该报所反映出的中日两国国际形象的差异与变化，并分析导致这种差异和变化的原因。此外，通过分析海外主流媒体涉及中国对外双边关系的报道，不仅可以折射出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国际社会公共群体如何认识中国、处理好对外关系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内容分析法，结合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力求使研究结果更为客观和准确。

1. 样本收集

(1) 研究媒体的选定

本文以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为调查对象。《纽约时报》是当今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巨大，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并称为“报纸中的报纸”，是美国的精英阶层乃至政府高层人物

①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第 383 页。

② David L. Protess and Maxwell McCombs, *Agenda Setting: Reading on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making*, New Jersey Hove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 转引自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第 378 页。

③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第 407 页。

的必读报纸。^① 美国外交官和议员们在辩论中也经常引用该刊物的信息。^②

(2) 时间范围的选定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日关系逐步走出 70 年代蜜月阶段的关键时期，双方领土争端问题开始浮现，并在两国关系中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 ProQuest 公司的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数据库，其对《纽约时报》的收录始于 1980 年 6 月 1 日。同时为了考察长时段该报对议题报道的变化规律，本文将数据的搜集止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

(3) 样本单元的选取

本文选取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议题作为媒体报道的议题选定，在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 Senkaku（尖阁列岛）、Diaoyu（钓鱼）、Territory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中日领土争端）、East China Sea（东海）等词，共获取样本 98 篇。

2. 分析项目建构

(1) 议题报道总量分析

议题报道总量是指该报对中日相关议题在所设时间段内的总的报道篇幅数量。通过对该项目的考察可以看出该报对这一议题的报道走势，以从宏观角度进一步分析该报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度。

(2) 样本单元的篇幅字数与报道类型

对样本单元篇幅字数与体裁的考察，是为了从广度与深度层面探讨该报对不同议题的微观分析，以进一步探索该报的报道特点与规律。

(3) 消息来源地

对消息来源地的考察可反映出媒体对新闻信息采集的客观性程度及其倾向性。

(4) 报道态度

本文在分析媒体报道态度时借鉴了国内学者的已有相关研究成果。^③ 本文所说的报道态度是指记者在写作时有意或无意地对报道对象流露出来的态

① 李瑛、何力：《全球新闻传播发展史略》，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8~105 页；刘勇：《大追寻：美国媒体前沿报告》，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5 页。

② 夏尔·菲利普·戴维、路易·巴尔塔扎、于斯丹·瓦伊斯：《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第 277 页。

③ 参见罗以澄、叶晓华、付玲：《〈人民日报〉镜像下的美国国家形象建构》，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 年第 21 期，第 93 页。

度和表达出来的感情色彩，依此将报道态度分为肯定性报道、否定性报道、客观纪实性报道、褒扬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和贬义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等五个评判指标，以此对《纽约时报》议题报道的态度倾向性进行分类。

其中，肯定性报道是指该报对议题内容持完全肯定的积极态度，如文中常常使用“合作”、“友好”等易使读者对报道对象产生美好联想的词汇。这种肯定性报道明确了记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并且对事件中所涉及到的中国立场是持支持和认同态度的。否定性报道是指对议题持完全否定的消极态度，不支持、不认同报道事件中的中国立场，常使用“镇压”、“极权”、“迫害”等易使读者对报道对象持批判目光的话语词汇。否定性报道明确了记者是不支持、不认同媒体事件中所涉及到的中国立场。客观纪实性报道是指报道以不带感情色彩的词汇向读者介绍新闻事实，通常比较客观。褒扬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是指报道语气以略带褒扬性色彩的纪实性报道为主，而贬义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是指报道语气以略带贬义性色彩的纪实性报道为主。这两类文章看似采用客观的纪实性报道，实则是对客观事实和叙事角度的选择巧妙地表达了记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通过对样本单元的内容进行梳理得出，虽然肯定性报道和否定性报道明确了记者对媒体事件中涉及到的中国立场是否支持，但并不涉及记者对日本立场的支持与否，而褒扬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和贬义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却同时包括对媒体事件中中国和日本的立场取向，即该报在表达对中国立场支持与否的同时，也明确了记者对日本立场的态度。

《纽约时报》视野中的中日领土争端问题

1.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总量分析

如图 1 所示，《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年平均报道量在 3 篇左右，说明该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总体关注度不高。图中的几个波峰点对应的正是中日围绕领土争端问题产生摩擦的时间，如 1996 年的波峰点反映的是该年日本政府宣布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将钓鱼岛包含在内而导致的中日双边关系一度紧张；2005 年的波峰点反映的是因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冲绳县石垣市市长扬言要登陆钓鱼岛“视察”，以履行所谓“行政首长职责”，以及石垣市议员拟于当年 6 月向市议会提议制定所谓

“尖阁列岛日”条例等，导致中日双边关系紧张；2010年的波峰点反映的是中日政府及民间在争议岛屿水域发生的多起摩擦事件而导致的双边关系高度紧张。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图中的多项式趋势线可推测出数据点背后的变化规律，即《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关注度呈缓慢递增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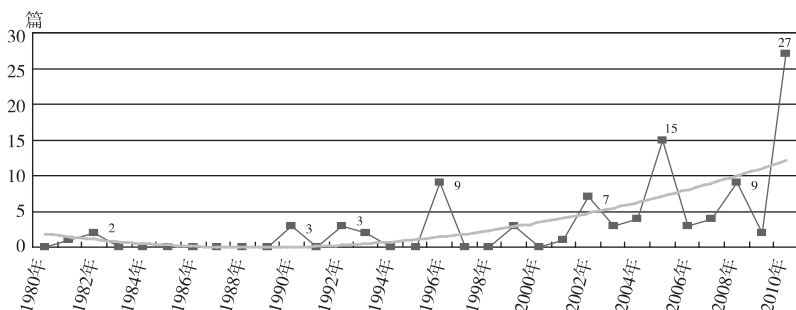


图1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年度报道数量走势

2. 对《纽约时报》样本单元的篇幅字数与报道类型统计分析

表1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篇幅统计

500字以内	500~1000字	1000字以上
18篇	48篇	32篇
18.37%	48.98%	32.65%

表2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类型统计

消息	评论	简报	读者来信
78篇	16篇	3篇	1篇
79.59%	16.33%	3.06%	1.02%

如表1所示，《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字数在500~1000字的新闻最多，占近一半；1000字以上的报道比例相对较小。如表2所示，《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报道主要以相对浅显的消息稿为主，有深度的评论只占16.33%。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报道以浅层次的陈述性报道为主，缺乏深层次的调查与分析。

3.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消息来源地统计分析

如图 2 所示,《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报道在信息来源地的选择上基本遵循了公平对等原则。来自中国的新闻素材占报道总量的 36.73%,来自日本的新闻素材占总量的 34.69%,基本持平。可见,《纽约时报》关于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报道在信息来源地的选择上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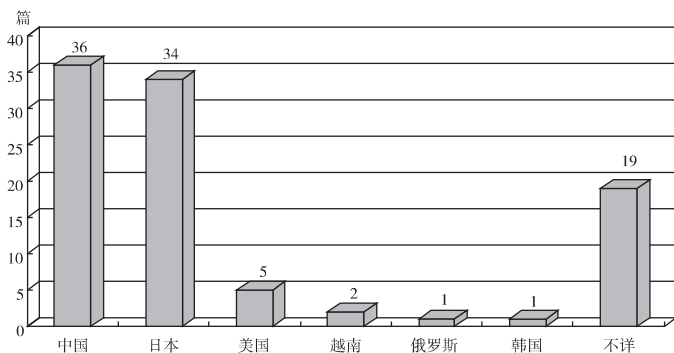


图 2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消息来源地统计

4.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态度倾向性分析

如图 3 所示,报道态度呈现否定性的样本为 37 篇,超过报道总量的三分之一,加上呈现贬义性话语的纪实性报道 18 篇,两者总数远高于客观纪实性的报道(34 篇),这反映出美国媒体在新闻理念上以“反常性”作为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①的客观事实。此外,从图 3 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在中日领土争端事件报道中对中国立场持完全支持态度的样本单元数量为零,而对中国立场持完全不认同或不支持的样本单元占了约 38%,同时,持中立立场的样本单元也占了约 35%,说明该报对中日领土争端报道的态度倾向主要以不支持中国立场,即不认同中国做法和不偏袒中日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为主。

^① 参见郭可、吴瑛:《世博会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作用》,载《外交评论》2010 年第 6 期,第 8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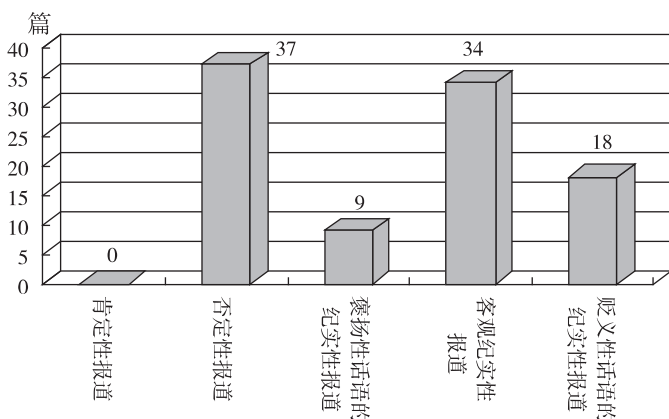


图3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态度倾向

5. 《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

议题一：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特性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价值效用”

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常引发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加之战争等历史问题与之交织，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日本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的不满和抗议。《纽约时报》同样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解读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

就中国国内政治而言，该报认为，中国政府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利用具有政治目的性。在该报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其依据是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①与此同时，在该报看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日趋淡化，而马列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如果此基础被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将会受到冲击，因此，为了加强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遂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特性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凝聚国内团结意识的工具。^②对于《纽约时报》的此种论调，在日本也有

① Nicholas D. Kristof, “As China Looks at World Order, It Detects New Struggles Emergi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1, 1992; Patrick E. Tyler, “Shifting Gears, Beijing Reins In Anti-Japanese Campaign”, *The New York Times*, Sep. 19, 1996; Howard W. French, “China to Curb Dissidents In Shanghai During Games”, *The New York Times*, Jun. 26, 2008.

② Nicholas D. Kristof, “China Builds Its Military Muscle, Making Some Neighbors Nervou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1, 1993; Patrick E. Tyler, “Shifting Gears, Beijing Reins In Anti-Japanese Campaign”; Joseph Kahn, “China Pushing and Scripting Japan Pro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5, 2005.

与之遥相呼应的观点。如毛里和子在分析战后中日关系时曾讲到，“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各种冲击的时候，让国民从什么地方求得认同呢？对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只有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了”。^①

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时常引起中国民众爱国主义情绪的爆发，但事实并非如《纽约时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公民没有自由与人权可言。该报总是透过固有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现实是，集会、游行和示威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力，1989年10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中国公民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作了全面规定。^② 中国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和支持公民合法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国公民通过游行示威的形式表达对日本行为的不满正是中国政府保障公民合法自由表达思想与言论的体现，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善和民主程度的提高。但是纵观《纽约时报》对中日领土争端议题的报道，却将中国公民的游行示威活动看作是中国政府用于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是对中国政治进程发展与进步的抹杀。

议题二：日本国内不同党派、集团对华态度不一

在《纽约时报》的视野中，日本国内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对华态度不一，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日本国内左翼倾向的党派及利益集团，其倾向于修复并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认为日本应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他们更加强调中日之间与日俱增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二是日本国内的右翼保守政党，该派主张日本对华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③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不仅对日本国内不同党派的对华态度进行了分类研究，而且还将其与美国国内不同党派的对华态度进行了联系研究，如认为美国的鹰派更趋向于支持日本的对华强硬派，而美国的温和派则对中日关系的日益恶化表示担心。^④

① 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家信访局，2005年1月13日。<http://www.gjxfj.gov.cn>

③ Martin Fackler, “After a Challenge, Japan’s Leader Shuffles His Cabine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8, 2010; Martin Fackler and Ian Johnson, “Japan Retreats In Test of Wills With the Chinese”,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5, 2010.

④ Norimitsu Onishi, “Race to Lead Japan May Turn on Asia Ties”, *The New York Times*, Jun. 4, 2006.

的确，日本国内舆论的对华态度并非铁板一块。日本国内存在着不同的对华战略主张或派别，在对华战略上主要有三派：一是亲美派或主流派，即主张在对华政策上完全追随美国，服从于对美政策的需要；二是重视亚洲派或理性派，这一派相对来说比较重视发展同亚洲的关系，特别是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三是右翼民族主义派，他们既反美、反华，也反对现任政府的对外政策。^①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国内不同党派对华态度的研究与美国大众媒体的类似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吻合的。

议题三：美国对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的立场取向

在《纽约时报》看来，美国政府对于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一贯采取中立立场或遵循不干涉原则。该报认为，虽然美日之间签有双边军事安全条约，根据条约，美国有协助日本保障领土安全的义务，但是当中日之间发生关于领土争端的政治摩擦时，美国却竭力回避对该问题的立场取向，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的领土主权诉求。^② 不过深入分析会发现，2000年来，美国在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表态上发生了变化，即尽管美国对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的中立立场没变，但是却是在是否强调《美日安保条约》上出现了变化。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除了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示中立立场外，还将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义务与是否军事干预中日领土争端的表态分开，正如一位美国政府官员所说：“对岛屿的夺取不会自动触发（美日）安全条约并迫使美国进行军事干预。”^③ 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中日领土争端表明中立立场的同时，更加强调了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同盟义务，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中日应该自己解决存在的争端，但是美国会履行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义务”。^④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表述则更为明确，她指

① 冯昭奎：《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1期，第15页。

② Nicholas D. Kristof, “Neighbors Voice Concern Cautiously”, *The New York Times*, Mar. 10, 1996; Nicholas D. Kristof, “An Asian Mini-Tempest over Mini-Island Group”; Nicholas D. Kristof, “Nationalist Critical of U. S. Air Base Is Elected Governor of Tokyo”,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2, 1999; Edward Wong, “China’s Disputes in Asia Buttress Influence of U. S.”,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3, 2010.

③ Nicholas D. Kristof, “Would You Fight for These Islands?”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0, 1996.

④ David E. Sanger, “Obama Presses China to Let Currency Rise”,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4, 2010.

出“争议岛屿在美日同盟条约的防卫范围之内”。^①

《纽约时报》将美国采取中立立场的态度取向部分归因于中国因素，如美国不会因为这些岛屿而甘冒与中国发生核战的风险，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② 除此之外，本文在对《纽约时报》三十多年的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间接推测出导致美国不干预政策的其他因素或可归因于韩国与俄罗斯。日本与韩国之间存在着独岛/竹岛之争，与此同时，日本与俄罗斯之间还存在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之争。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美国有协助日本保障领土安全的同盟义务，如果美国根据条约干预了中日领土争端，那对美国来说是否意味着，一旦日韩因领土争端而起了冲突，美国在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去协助日本的同时又要根据美韩同盟条约去协助韩国的领土安全？这或许就是美国的“同盟困境”而导致的美日韩三边同盟效力因日韩存在的双边问题而大打折扣的原因之一。日俄领土争端与中日领土争端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俄罗斯实际占领着北方四岛，而后者是日本实际占领着中国的钓鱼岛。如果美国协助日本占有别国的领土，那对美国与日本来说，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占有北方四岛也是合法的？可见，美国对日本与邻国之间所存在的领土争端问题采取中立立场还与美国所处的矛盾处境有关。

议题四：领土争端中的话语表述与使用“钓鱼岛”与“尖阁列岛”频率对比

在对中日领土争端中所涉及到的主权归属问题进行报道时，《纽约时报》使用“中国与日本以及台湾对该岛屿有主权诉求”^③ 的话语表述在 98 篇样本中出现了 33 次，达到总量的三分之一。

① Mark Landler, “U. S. Seeks to Alla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Oct. 31, 2010.

② Nicholas D. Kristof, “Would You Fight for These Islands?”

③ Henry Scott Stokes, “Oil Riches Off China’s Shor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19, 1982; Nicholas D. Kristof, “China, Reassessing Its Foes, Views Japan Warily”,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3, 1990; Nicholas D. Kristof, “Seoul Sinks Imaginary Foe at Islet”,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6, 1996; Nicholas D. Kristof, “Japanese Premier Is Off to Mend Fences With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l. 8, 1999; James Brooke,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a Pacific Tug of War”, *The New York Times*, Oct. 2, 2002; James Brooke, “Drawing the Line on Energy”, *The New York Times*, Mar. 29, 2005; Keith Bradsher and Edward Wong, “Taiwan’s Leader Outlines Hi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n. 19, 2008; Ian Johnson, “China and Japan Bristle Over Disputed Chain of Islands”, *The New York Times*, Sep. 9, 2010; Martin Fackler, “Japan Plans Military Shift to Focus More o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3, 2010.

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对华立场，美国和日本与新中国建交时，也明确了不支持“两个中国”等有意分裂中国的态度和立场。《纽约时报》通过使用“中国与台湾”等话语设置议程，实现了对中国议题的某种“话语权力”。按照这种话语设置的议程，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中一台”舆论氛围，这种企图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分裂开来的话语氛围，对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对台政策是极为不利的。

与此同时，在媒体话语表达上，《纽约时报》在 98 篇样本中使用 Senkaku 频率达到 58 次，而使用 Diaoyu 或 Diaoyutai 称呼仅 36 次。Senkaku Islands 是对“尖阁列岛”的英语表达，是日本对中国所属钓鱼岛的称呼，Diaoyu Islands 则是对中国钓鱼群岛的英语表达。该报对同一岛屿的不同用语指称频率明显偏向于日本，这种话语环境同样对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对钓鱼岛的主权极为不利。

议题五：《纽约时报》视野中的中日国际形象对比

通过梳理《纽约时报》三十多年的有关中日领土争端报道，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的头十年，报道中充斥着“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纽约时报》视野中的“中国威胁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中国经济威胁论，二是中国军事威胁论。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中国经济威胁论的依据来源于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经济对比，如认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掠夺了邻国民众的就业机会，中国引进的国外投资递增，而邻国的国外投资额却在减少。^①该报据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损害邻国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

在该报的话语环境中，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声音要远高过中国经济威胁论。该报在报道中国及其邻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事件时，其话语中影射着中国海军建设力量对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所构成的潜在军事威胁。如，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必然会引发军事力量的改革和提高，如果中国与邻国之间不存在边界纠纷的话，那么中国的军备力量发展不会引起很高的关注度，但是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诉求再加上其海军力量的发展明显

^① Erik Eckholm and Joseph Kahn, "Asia Worries about Growth of China's Economic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4, 2002.

给邻国造成了军事威胁。^① 该报关于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另一个依据是 1996 年台海危机时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威慑举动，间接让邻国对中国未来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军事举动充满了怀疑和不确定性。^② 该报的话语环境中，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诉求严重威胁着日本的海洋能源利益。该报指出，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其所需能源资源完全依靠进口，尤其是石油资源。日本的中东石油运输路线途径波斯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以及龙目海峡，因此，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诉求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军备发展必然对日本的海洋战略构成威胁。^③

此外，在该报话语环境中，除了上述在硬实力领域中国所呈现的是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者形象之外，在软实力领域，该报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以及“恃强凌弱者”。

首先，该报描绘中国的“功利主义形象”的佐证有，中国为了保障本国的石油利益，做出间接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举措，如中国反对惩罚自己的石油伙伴苏丹在达尔富尔地区的行为，并且阻止关于伊朗的核武器计划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④ 再如，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奥运会顺利进行以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以及与日本领土争端问题上在一贯的强硬立场上让步，转而采取缓和和矛盾的态度，做出接见达赖喇嘛的代表并积极向日本伸出橄榄枝的举动，以展示中国对日友好关系。^⑤

其次，在《纽约时报》视野中，中国的“恃强凌弱”形象主要是针对日本而言。该报认为，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对日实施西方惯常使用的强硬大棒政策，“口头威胁”与“经济制裁”并行，对日本实施强硬的稀土

① Nicholas D. Kristof, “China Builds Its Military Muscle, Making Some Neighbors Nervous”; Edward Wong, “Naval Show to Feature Submarines from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Apr. 22, 2009; Edward Wong, “China Shows Focus on Territorial Issues as It Equates Tibet and Civil War South”,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4, 2009.

② Nicholas D. Kristof, “Neighbors Voice Concern Cautiously”.

③ James Webb, “Warily Watching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3, 1999; Norimitsu Onishi and Howard W. French, “Japan’s Rivalry with China Is Stirring a Crowded Sea”, *The New York Times*, Sep. 11, 2005.

④ Joseph Kahn, “Behind China’s Bid for Unocal: A Costly Quest for Energy Control”, *The New York Times*, Jun. 27, 2005.

⑤ Martin Fackler, “In His Visit to Japan, China Leader Seeks Amit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8, 2008; Edward Wong, “Getting in Shape for Games, China Strengthens Ties With Neighbors”, *The New York Times*, Aug. 5, 2008.

贸易禁运以求达到其政治目的。政局不稳而经济又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最后屈服于中国的威慑，在外交上对中国作出让步。与之相反，中国对待美国却基本上是毕恭毕敬小心周旋（largely politeness and deflection）。^①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中日本的国际形象与中国却截然相反，昔日辉煌的日本在外交行为日趋独断化的中国面前“敢怒不敢言”，成为被强大的中国所欺凌的弱小国家。该报还认为，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触发了日本的军备改革计划以及对美日同盟的加强，在此过程中，日本完全处于被动状态。^②

媒体舆论与双边关系研究的启示

“国家形象”在全球化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损害国家形象，实际上就是损害国家利益。^③ 因此，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雷默（Ramo）所指出的，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reputational capital），而声誉资本的缺乏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④ 中国正在努力从各领域加强国家形象的塑造，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认识中国，这的确有益于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但是，良好国家形象的传播毕竟只是作为主体的中国主动地、有目的的单向传播，与透过中国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的对外行为所捕捉到的国家形象相比，在第三者看来，后者所影射的中国国家形象比前者——即中国主动宣传塑造的国家形象——更具有可信度与说服力。国家形象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国家形象与恶劣的国家形象所起的效果是相互掣肘的，因此，中国应该意识到，中国无意之中所塑造的国家形象会抵消中国积极努力主动

① David E. Sanger, “Three Faces of the New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6, 2010; Martin Fackler, “Turning Tables, Japan Asks China to Pay For Damag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7, 2010; Andrew Jacobs, “China Softens Its Remarks In Dispute With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Sep. 29, 2010; Mark Landler, “U. S. Seeks to Alla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Martin Fackler, “Japan and 2 Neighbors Try Talks to Settle Disputes”, *The New York Times*, Nov. 14, 2010.

② Martin Fackler, “Japan’s New Military Policy Keeps Wary Eye o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7, 2010.

③ 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版，序言第1页。

④ 同上，序言第3页。

塑造的良好国家形象所带来的效用。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媒体对他国或国际事务的报道往往会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无论媒体的报道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公众的接受程度都很高。^① 美国媒体对中日双边关系的报道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影响政府决策者对两国关系的审视和定位。除此之外，海外主流媒体涉及中国对外双边关系的报道，不仅可以折射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同时也为了解国际社会公共群体是如何认识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依据。

中国应该从西方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日形象变化中认识到中国是怎样被呈现给国际社会大众群体的，这种国际形象是否有利于中国在对日态度上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

对中国来说，应从两个层面来应对国家形象所面临的挑战。一是有为而为，即将自己作为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主体，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实施的力度，讲事实，摆道理，树依据，争取全方面、多渠道地加强与国外公众的沟通与交流，澄清误解，汇聚共识，即使在对日态度上争取不到有益于中国立场的国际舆论环境，也要力争争取到相对客观的国际舆论环境。二是无为而为，即将自己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客体，在除公共外交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间接塑造国家的良好国际形象，如在亚太地区性合作机制或全球性治理机制中，以符合世界大国的身份去展现中国的外交风范，让国际社会从中国的实际行动中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在多元化的舆论环境中，用包容的心态积极看待海外媒体中负面的中国形象，正视问题产生的原因，积极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以开放的心态理性务实地构建和塑造中国的真实形象，这将是中国自信的国家形象的展现。

①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第 407 页。